



边界漂移的

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
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

乡土

戴庆中 王良范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戴庆中 王良范 等◎著

边界漂移的

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
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

乡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界漂移的乡土 / 戴庆中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04 - 7420 - 3

I. 边… II. 戴… III. 少数民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308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

全球化作为一种强劲的人类历史趋势，正冲击或逼近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所有特殊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都会因此而发生变迁——无论它是当下拥有强势的文化还是处于弱势的文化，因为全球化运动所产生的种种生存问题，已经超出了既有的各种人类文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得有新的能更有效适应全球化生存环境的文化形式被人类创造出来。虽然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形式究竟会是怎样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准确的预测，但各种文化于当下都在寻找和建构自己的新形式，各个民族都希望能够找到调适于全球化生存环境的生存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也就是在发展的视野下研究全球化时代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这些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能否找到和如何建构自己的现代形式。在这里倍受关注的问题是，各种地方化的生存样式、民族性（尤其是草根族群）的文化特质在全球化趋势下能否继续存在，以及它们要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全球化是否意味着祛除地方化和民族性。时至今日，无论我们从发展的客观事实看，还是就发展的自觉选择看，全球化都不会是地方化、草根性人类生活特质的消除。一方面，地方性、民族性文化在主动或被动地接

受那些致使其本身改变的异质文化因素时，并不轻易就放弃自己那些“草根性”的本质要素；另一方面，恰恰是要通过这些地方化草根性文化的自我觉醒、自觉改造与自建重构，当地人才能真正适应全球化时代新的生存环境。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地方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下能不能生存和要不要发展，也不是祛除地方性和民族性，而是各种地方性民族文化在这一趋势下如何生存与发展。发展已是确定的事实和过程，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我国边远地区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实际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过程作出一种判断，并力求去寻找或揭示既能够有效调适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又不丧失自己独特性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形式。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以自己的“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存在的文化，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对其他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就是指全球各种文化（生活方式）相互面对、沟通、传播、碰撞、影响、制约、交融的趋势。也就是说，虽然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的后果，但全球化的后果却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单向度全球覆盖，而是多样性文化的相互展现与对话，是现代性的多向度展开。因此，全球化趋势下人类文化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多元化和多中心化，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也因此而获得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们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和草根性力量，完全可能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在与其他文化的积极互动中为人类文化的重构做出贡献。

二

全球化是现代性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建构，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使现代性成为了人类各种现存的文化为了其适应性要求都要经

历的发展形态。这不是说全球化创建了文化的现代性，而是说它加速了各种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并提供了现代性特质在不同文化间传播和相互借鉴模仿的机制。我们相信，人类的各种文化类型本身都存在着某些具有普遍性、可以萌发现代性的“因子”，之所以西方文化率先实现了现代性而其他文化没有，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内部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利于甚至是抑制了这些现代性因子的萌芽和生长。我们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各种文化所建构的现代性，虽然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原则，但总归会保持它们独特的价值选择。任何一个文化的现代性过程，总体上都会是一方面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沿着自己文化的历史逻辑，在与其他异质文化彼此碰撞、相互交流和汲取中实现的自我现代性。因此，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图景，应该会是“多元的现代性”（吴冠军，2002），人类文化的未来形式，应该会是有一定普世性，同时又保留了多元文化特质的文化形态。

“多元的现代性”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普遍的东西不是“先在”或者“预置”的，它最先肯定是产生于某一特殊人类群体的实践，然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显现出来。一个由某种特殊文化“发明”出来的文化因子，如果能够为其他文化所选择和吸纳成为其有机成分，这个因子就具有了“普世”的意义，就像发端于西方文化的各种现代性价值。当然，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因子在“此文化”中的具体形态和在“彼文化”中的具体形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些差别恰恰说明了这个文化因子已经扎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之中，成为了它们“特殊性”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同时也越来越明确的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认同诉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共同体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文化需求。也就是说，对文化独特性即差异性的自觉坚守，已经成为全球化趋势下

各种文化发展的主要取向，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普遍性的文化发展趋势。人类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共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多元的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经验与各种地方性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发展中自觉建构它们的有机统一；有助于我们正视并正确对待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了解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与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之间的矛盾统一，这对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种自觉。

多元的现代性也是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图景，因为在全球化生存环境中各种文化都要做出现代性发展选择。全球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也成为一种基本趋势，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被卷入这一趋势当中。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主要还是“被推进”的，但由于这一推进过程不再是过去那种“梯度”节奏和模式，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限制的推进，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共时性和零距离特征，使这些文化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期，它们与异质性文化的接触、碰撞和交流也前所未有地直接和彻底。这即是说，在全球化的现代生存环境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都要做出“现代性”的发展选择，因为只有现代性文化才能支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毫无疑问，现代性之于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一次传统的裂变。各种现代性文化元素，不管它们是源于本文化的自我发明和创新，还是自外部传入的异质文化因素，要真正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土壤，成为这个文化的有机因子，都必然从根本上“撼动”这个文化本身。对于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来说，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它要经过一个“文化剧变”的过程，是一场意义深刻的“文化革命”。但这场革命绝不是从外部去“革”这些文化的“命”，而是这些文化在适应现代生存环境的要求下“自我变革”，是它们

“自己革自己的命”，是自我现代性。只有坚持这种“主位”立场，经过“革命”后的文化才能保留它们自己的传统“基因”。

换言之，现代性虽然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但不是说它们都要去“追随”、“模仿”或者“移植”西方的现代化，更不是要造就一个同质化（或者价值趋同化）的人类文化世界，而是说每一个文化，无论其强弱大小，都必须能够有效地适应当下生存环境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基本架构以及日常生活方式进行自觉的改造和重建，以使自身实现现代性。根据人类文化自我变迁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各种文化自身都具有调适于环境变化的能力。就像哈维兰说的，许多传统社会根本不是不能调适，而是没有机会摸索出它们自己的调适方法。^①因此，一种文化要发展建构怎样的一个现代性，是这种文化自我选择的结果，而全球化为各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选择所提供的空间，显然是以往那种单一的主体文化输入和相似的周边文化影响所提供的选择空间不能比拟的。

通过选择建构的民族文化现代形态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图景，应该是一种既具有一定普世性（共性）、同时又保留了多元文化特质（个性）、体现了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人类文化形态。这一图景的基本含义是：以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的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环境、解决人类现代生存问题为目的，通过不同文化间更为平等的交往、互动和学习借鉴而形成的具有价值多元和形式多样特征的现代性。在这样的图景中，现代性的一般价值作为基本取向会在各种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显示出来，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的具体含义和表现形态会有差别甚至大相径庭。各种少数民族

^① [美] A.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04页。

文化的现代性形态之所以会包含某些普世的价值和共性的因素，除了因为人类文化有着共同的本质属性——人类共同体适应环境、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和机制，以及各种文化自身都包含着某种可发展、可现代性的因子之外，还因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条件的相似性——发展整体性、交往普遍性、各种活动舞台的共同性，特别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亚形态，本质上具有同根性，再加之标准化力量的作用、文化要素传播的便捷与广泛。举凡所有人类文化各种样式，一个绝对没有吸纳过异质文化因子、完完全全是“自我发明”的文化，恐怕根本就不存在。

多元的现代性构想对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建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克服那种将文化发展当作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向强制推进过程的理论视角和思路，对于我们寻求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具有深刻的意义。其次，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经验与各种本土化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发展中自觉建构它们的有机统一。我国各少数民族或族群可以通过对现代化要求的积极回应，唤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积极的改造，致力于构建一种本土传统与现代性要求有机结合的意义系统和生存模式，将本土社会的现代化目标与本土文化的现代性目标统一起来。再次，它有助于我们始终正视并正确对待必然存在的文化地域性差别。只要地域环境的差别继续存在，不同的文化样式和它们所蕴涵的那些与地域环境相适应的独特价值就会继续存在。同时，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构想，对于我们真正承认和保护各民族（族群）文化特色和精髓，为其自我发展提供宽容和平等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是一种有力的理论支持。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可以持续满足各种文化间的互动和互补的需要，这对于人类文化整体的进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

在全球化趋势下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最为尖锐的矛盾就是“要求发展”与“寻求认同”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有自我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它必须适应并满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求获得更好的生活。用目前通用的发展指标来测量，我国边远民族地区也是我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不发达就意味着需要发展，发展正是这些地区不容置疑的选择。虽然发展最主要内容和最直接标志是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如果得不到社会整体进步尤其文化改造与重构的支撑，就会从根本上落空，因为文化是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方式，更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同时，由于文化与人类群体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化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选择和发展过程，因而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既有的发展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社会发展目标、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和确定，与这个社会的成员所信奉的价值直接相关，人们总是会去追求自己意愿的那种生活；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该是由这个社会的成员自主决定和自力担当的，这是发展的历史本义。文化则是与一个民族或族群自主决定和担当社会发展的能力直接关联的，因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历史实践中活生生存在的人与他的文化是“一体”的，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面对世界的方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机制。

我们认为，无论发展理论还是发展实践，都不能无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在当地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应该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血脉相连”，应该体现为这些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调适、自我改造和自我重构。如果看不

到一个社会及文化所经历的历史沿革，不考虑它们借以重复发生的自我再生机制，不仅是发展的起点会变得模糊不清，就连发展的目标也无从确定。这样形成的社会发展计划，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义；与其说是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计划，不如说是其他社会发展计划的扩展或延伸，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只是这个计划的一个从属部分。这样的计划如果推行，就算不会遭到当地社会的强烈抵制，充其量也只能带来一种依附性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各民族文化适应全球现代化生存环境的积极改造与重构，而只是一味地保护和守成，当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落空，甚至会沦为一种更具“依附性”的文化保护区，这就更是背离人类发展的历史本义了。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经济社会欠发达和主体社会—文化变迁的三重压力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还要承担应对冲击和满足族群认同要求的历史重任。保持身份认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任何人群社会在改变其社会状况时，都会自觉（程度有所不同）地维护对其群体认同来说极为重要的传统价值观以及文化的完整性，以为人们提供身份认同和生存意义。因此，当全球化带着异质性强势文化渗入我国边远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当地的少数民族为了保持自己族群身份，总会从自发到自觉地让自己在文化上有别于那些外来者——即使它们是代表着主体或主流，总会千方百计地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认同。通过对这些地区长期考察我们注意到：越是被新的、陌生的东西所包围，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就越是自觉地捍卫他们所熟知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质。

探讨全球化、现代性语境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的文化变迁、文化复兴、文化建构以及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着眼点。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激荡下，那些在文化上还保持着传统文化元素的少数民族面

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传统的、草根性的地方性知识正在被地方性人民作为一种深厚的社会文化资本在重新启用。通过国家、市场等中介，全球化、现代性对地方原住民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影响。地方原住民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的经历中，其文化变迁随着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面貌。今天更多的少数民族族群正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并通过这种行为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其实，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是现代性、全球化之后引发出的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所谓“认同危机”即是发生在现代性过程中的。认同问题大至国家、民族文化，小至地方、族群文化。可以说，族群认同和地方认同是当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发动这种内驱力的，正是全球化趋势下弱小族群的认同危机。在全球化趋势下，各种外部的投资开发者涌入我国边远民族地区，由于（暂时性的）缺乏在全球化舞台上竞争的社会资源，当地族群往往很容易就被排斥到本土社会的边缘，逐渐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同时也失去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这就是所谓认同危机。而恰恰是在当前这样一种以流动性为本质特征、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社会生活中，身份认同更成为人们的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需要。文化身份，对于本土化的少数民族个体来说，可能是他们在全方位冲击和挤压下的一个最基层的身份，靠着这样一种身份认同，他们才有了一种归属感，才得以对“我是谁”这样的认同需求有一个确定的回答。当然，地方性原住民在现代化、全球化不断渗透的现实面前，也在努力寻找同现代性融合的可能，并且也在接触和接纳现代性文化时努力地进行着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而在建构的过程中，地方性的文化和当地的族群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认同。

文化复兴对于民族群体的自我认同有重要作用。因为，通过对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传统仪式、服饰、祖庙、民居风格等的刻意恢复和保留，可以使一个族群重建文化自觉，还可以通过重构其文化记忆而完成对新生要素和特质的整合与认同。因为，在仪式复兴过程中对古老传统的刻意模仿和保留，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传统的神圣性，而“世俗只有在被赋予了神圣性之后，它才能成为完成社区整合和规范社区成员生活秩序的象征性权威”^①。这个过程及其结果，对于一个族群社会在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中自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保存象征性符号也是社区权威和秩序重建的重要机制。在中国的村落视野中，权威的来源是相当多元和复杂的，包括土地所有者、村政府、有文化的人、有号召力的人、仪式和族谱专家等等。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的乡村社区来说，处理地方性公共事务的权威包括四个标准：道德权威、政治影响、仪式专长、个人魅力。因此，传统仪式的复兴可以重建社区或者族群社会的权威，进而实现社区或族群社会权力秩序的重建^②。

现代性和各种地方性文化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互动，可以看做是面临着一个双向的，甚至可能是双赢的历史机遇。国家、政府希望通过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加速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性民间社会也在积极利用和配合国家政策、政府需要和市场需要，随时准备恢复和强化自己的地方性民族性文化特质。同时，政府、市场也意识到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文化资源大有充分开发利用的余地，以期总体上增加国家的现代化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地接纳现代性资源的过程。在经历了包括

① 沈洁：“寻找回来的世界”，《读书》，2004年第6期，第53页。

② 同上。

“社会制度改造”、“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家庭联产承包”、“打工潮”、“商品经济”、“旅游开发”等一系列对他们来说具有“现代性”历史事件的洗礼之后，他们已经学会将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图景中来反观自身。

四

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首先，全球化可以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以往的弱势地位。全球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各个地区——不论其发达还是欠发达、中心还是边缘——都同样面临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边远民族地区如能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在形成新的秩序和格局过程中改变其边缘化的区位优势。这种改变，有助于消除原有格局下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形成的弱势文化心态，建立起本民族文化自信，这不仅可以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以发展经济、争取较好的生存条件，而且可以开掘本民族文化的潜藏价值，为建构现代性文化提供资源，甚至可以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建构做出贡献。

其次，全球化使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与其他文化同等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跨地区资本、技术等直接介入了各个地方性社会。于是我国边远民族地区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更直接、更全面地接触和面对包括西方强势文化在内的各种异质文化的可能。这能从根本上打破过去那种“先进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从主体人群向亚群体“梯度推进”的发展模式，而将所有民族的文化适应调适置于同一平台，从而有效地缩小甚至消除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的空间距离和时间差距，甚至可能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再次，全球化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重构。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本身的边远性和相对弱小，处在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系统的边缘位势上。然而正因为其远离中心，相对汉文化主体具有更多离散性和自由度，它们的某些今天仍处在无序状态的优秀特质，一旦碰到适当的契机与条件，就有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系统，并具有更加适应现代环境条件的系统特征和发展优势。而经济全球化趋势，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契机和条件，如有效把握之，可以促进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例如，伴随生态问题而来的全球后工业运动，在肯定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可耗尽性的前提下，提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类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的问题，解决生态问题得从人类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入手，即从人类文化的自觉改造和重建入手，问题在于寻找建构新文化形态的资源。我国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面对自然不是施以统治，而是追求和谐与相融，至少是敬畏，经过充分发掘和重新建构，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更加适应目前人类生存环境、可以克服生态危机的文化类型。虽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与相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只是在近百年“西方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这种特质已逐渐在生活实践中式微，而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边缘化的位势，过去较少受到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才在生活实践中保存下了这样的特质。

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优势要得以发挥，必须确立这样一种理论立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对这些文化提出了发展要求，如果不发展，它们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这些文化的发展，不是对本身传统的放弃，不是简单地趋同于某种强势文化，而应该是以同异质文化交流（交融）为条件，以本土文化的自我改造和重构为根本，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生存环境为目标取向，实现本民族（族群）文化的发展。同时，

上述优势要得以发挥，我国边远地区各种少数民族文化都必须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必须去发掘和建立本文化的创新机制和学习机制，必须解决好创新与传统、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草根性”的关系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令可能的优势变为实际的优势。

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体现了文化自身的变迁发展规律。从文化变迁的动因看，全球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要适应对于本族群来说全新的生存环境，为族群提供新的解决生存问题的有效机制，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必须发展自身。从文化变迁的机制看，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还有可能带给人类文化新的活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融，可以促成新的人类文化形态的萌芽和生长。

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挥自身发展优势、实现自我现代性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主体的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文化自我现代性的必要前提。文化现代性，最根本的就是改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对自我、也就是对他们自己文化特性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地实现其文化的现代建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共同来说，文化自觉一般会带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也就是说，借助文化自觉可以完成文化变迁的社会动员，如果得到适当引导，文化自觉进而文化自信，是文化自我发展的首要前提。第二，培育和完善变迁机制是文化发展的具体途径。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即：基于一定时代、一定历史环境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定行为或观念的发明或者借用——创新与传播，经由一定文化解读或诠释之后的选择——采纳或抵制，通过广泛的模仿而使之得以整合为该文化的组成部分，使该文化发生变迁或得以发展。这实际上是“怎样做才能使发展得以实现”的问题。第三，“学习型文化”的建构，是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学习型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吸纳和创新，一个文化能够创造和吸纳

新的要素和特质，它就是学习型文化。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所具有的亚文化属性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自我成长还不充分，体系也不甚完善，本质上往往更为开放，更具吸纳新质要素的空间，更有学习的需求，因而也更有建构学习型文化的可能。学习型文化的建构，关键是一种制度性建构、一种人文环境的营造。